

郑德荣 主编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论

YOUZHONGGUOTESESHEHUIZHUYILUNCONG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组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郑德荣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济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郑德荣主编.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 7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李文海主编)

ISBN 7-209-02413-1

I. 社… II. 郑… III.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中国 IV. D6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郑德荣 主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日照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125 印张 4 插页 290 千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9-02413-1
D·576 定价: 17.80 元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编委会

主	任	李文海		
副	主	任	陶德麟	田心铭 张士宝
委	员		黄楠森	许征帆 高鸿业
			钟哲明	郑德荣 赵明义
策划·组织		张士宝	任 青	李运才

总 序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李文海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校 长

我们刚刚隆重纪念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从这次全会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如果没有在这个科学理论指导下 20 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实践,也就不可能有这一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

这套“论丛”在 1999 年出版,从时间上说,虽然并非刻意的安排,却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事。80 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50 年前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以及前面提到的 20 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来说,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由于 1999 年是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因此,当人们在此时估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意义时,便十分自然地会引发起从世纪历史的角度去思考的兴趣。

“社会主义”一词,在晚清时期就已开始传入中国。在上一个世纪末,我国的政治界和思想界就有过几次传播“社会主义”的热潮。但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还多半是作为一种学理来进行宣传和讨论,传播或者鼓吹者大抵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信奉者,有些人即使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他们所了解和追求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相去甚远。直到五四运动前

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把社会主义真正作为一种长远追求的崇高目标。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在 20 世纪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巨大成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20 世纪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可以说是探索的世纪、变革的世纪、发展的世纪,而所有的探索、变革和发展,都是紧紧围绕着自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就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两大历史任务进行的。这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前提的。大体说来,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无数志士仁人经过艰难的探索,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巨大变革,终于完成了头一个历史任务,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确立,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本世纪上半叶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标志。

新中国的建立,开辟了民族振兴的广阔道路。本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带领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不失时机地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这是一个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任务。在探索过程中,在变革过程中,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过胜利,也有过挫折;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一直到进入了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在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实现了本世纪以来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才有了今天经济和社会生活如此迅猛而深刻的发展变化。在即将迈入新的世纪的时候,全国人民才能以如此坚定的步伐,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

伟目标英勇奋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任何成例可援的创造性事业,当然也不会是一条没有任何艰难和风险的“平安大道”。目标已经确定,但征程还很漫长;道路已经开通,但探索并未终结;基础已经牢固,但挑战依然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工作者理应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不断增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使我们能够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坚定信念,振奋精神,及时识别和排除各种干扰,更好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这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和目的组织编写的。

在酝酿组编这套“论丛”的时候,作者、编者和出版者曾在一起做过研讨,大家一致认为这套丛书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特别的努力:一是要在全面、正确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指导,这当然毫无问题,因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既然是一个完备的科学体系,自然只有用科学的态度来加以对待。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在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片面性、绝对化、简单化甚至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实用主义等现象,还是屡见不鲜。这种不良学风,既损害了邓小平理论的声誉,又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是应该坚决避免和反对的。二是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重大问题,不仅要有理论的阐述和说明,而且要有对有关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解剖,避免从书本到书本,空发议

论,而应始终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三是坚持双百方针,努力做到两个服务,即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对学术问题,要提倡不同观点的平等讨论和相互切磋;对思想认识问题,要积极引导,以理服人;对事关政治方向、重大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分清是非。同时,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既不应该回避,也不应该只限于对既往事实的经验总结,应该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这样,才能把理论宣传和决策咨询的作用更好地统一起来。

这套“论丛”的作者,大多是各高等学校的资深教授和学术名家,也有一部分颇有成就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他们努力按照上面提到的编写原则,深入钻研,精心写作,共同完成了全部 12 种著作。对于他们严肃认真的治学作风,我代表编委会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我们也要对山东人民出版社决定组织、出版这套“论丛”以及在出版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致谢。至于这套丛书是否真正达到了上面所说的要求,我们只能把评判的权利交给读者朋友。不论读者朋友对作品做出什么评价,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能够以这套丛书,作为参与其事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告别难忘的 20 世纪、迎接辉煌的 21 世纪的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1999 年 1 月 11 日

于人民大学林园

目 录

总 序	(1)
一 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道路	(1)
(一)近代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道路	(2)
(二)现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与中国特色的 革命道路	(13)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7)
二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与定位	(49)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	(49)
(二)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理论 与实践	(60)
(三)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新概念	(79)
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由来及发展	(98)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探源	(98)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 历史过程	(120)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战略	(137)

四 基本国情与基本特征	(151)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151)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169)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	(200)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	(227)
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党的基本路线	(262)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条马克思 主义路线	(262)
(二)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航向与保证	(285)
(三)实施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纲领	(304)
(四)衡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工作的 根本标准	(321)
六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 的基石	(336)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社会主义 本质论	(336)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社会主义 根本任务论	(341)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社会主义 改革动力论	(348)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论	(355)

(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一国两制”论	(362)
参考文献	(374)
后 记	(377)

一 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道路

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情况和自然情况、历史情况与现实情况的统一,包括人文社会国情和自然国情两个方面。人文社会国情主要是指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及国际大环境,自然国情包括地理环境、人口、资源、民族等。国情又分基本国情和具体国情。基本国情系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历史阶段,具体国情则指各个方面的基本状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千头万绪,观察国情最基本的是看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据此判断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历史方位。

中国近现代国情同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而,由于五四运动之前和之后国际大环境的不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又有近代和现代之分。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不久,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而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国情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国情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发展道路。在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领导过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两次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但结果都是血的教训。中国近现代历史表明,由于中国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只能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

了必须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能把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 近代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道路

19世纪中叶以后,面对滚滚而来的西方近代化浪潮和坚船利炮的冲击,闭关自守、腐朽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面临两种抉择:一是走仿效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一是走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近代化道路。前者反映出萌芽中的资本主义与胚胎中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封建社会末期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后者反映出封建主义势力为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帝制,推行地主阶级某种改良措施的愿望。前者由于社会基础薄弱,又受到外来殖民侵略和国内顽固势力的压迫,未能如愿以偿地正常发展,结果使中国丧失了走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道路的历史机遇;后者依仗其握有的国家权力,依附外国侵略势力,遏制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使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 地主阶级改良派洋务运动的破产使中国丧失了近代化的历史机遇

19世纪60年代,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生长,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入侵,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清王朝统治者们沉溺于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酣梦幻境,国势日蹙。封建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汉满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之间的矛盾,都在日益激化;整个社会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声势

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正是这些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产物。具有一定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色彩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统治阶级无法按旧体制统治下去了。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清江山,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营垒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试图移植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之花,接中国封建体制之木,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国方略,发起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他们最早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创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军工、民用等近代化企业,同时也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然而,洋务运动的本意并非要走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而是依仗其政治权力,企图利用近代生产技术,来维护并巩固封建统治者的宝座。即使如此,洋务运动也遭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与攻击,并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破产。这场运动既没能挽救日益衰败的清王朝的统治,又未能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滋生和发展了具有浓厚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提供了有利条件。洋务运动阻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的道路,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比照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洋务运动的失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都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同处于封建社会末期,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使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厄运,封建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不能再统治下去了。然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洋务运动使中国继续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陷;明治维新则使日本走上了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并成为世界列强之一。

究其原因,是由于两者的政治目的、社会发展道路以及运动策划者代表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利益上的根本差异所致。洋务运动的政治目的是为了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维护封建帝制的

统治,企图为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注入一针“强心剂”;明治维新虽然也允许保留天皇制,但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推行立宪政治,创立国会和政党,其政权性质和政治体制日趋资本主义近代化。在对外关系上,中国的洋务派仰仗西方列强镇压农民革命运动,实行妥协投降政策,同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从而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日本明治维新则通过外交途径,力争废除幕府时代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引进西方的近代生产技术时照搬照抄,缺乏创新和改造;而日本则把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根据国情有机地改造创新结合起来,走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

历史经验表明,在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浪潮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下,19世纪后半期的东方落后国家即使已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威胁,如果能够励精图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化道路,仍能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便是明证。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实行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变革,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近代化。如果封建统治集团违背历史规律,对外妥协投降,出卖国家主权,对内残酷镇压农民革命,遏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不管引进多少近代化生产技术,也不能走上近代化道路。这便是洋务运动的破产留给我们的启示。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总是要服从其内在规律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般和整个说来,偶然性在历史现象领域内也一样地支配着,但是,凡表面上是由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本身始终是服从于内部的隐秘的法则的。全部问题仅在于要求发现这些法则。

2. 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变法运动的夭折

维新变法运动是在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

机加深,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有初步发展的条件下,由其政治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依靠光绪皇帝发动的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维新派试图采取不流血的和平手段,通过君主立宪道路,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刷新内政,抵御外侮,把古老的封建专制国家变成一个资产阶级近代化国家。

1883年12月爆发的中法战争是法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执行的妥协投降路线葬送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换来的胜利成果,造成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中法战争的失败唤起了康有为爱国革新的激情,他毅然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不久,他又在广州设万木草堂招生讲学,介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维新思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腐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哗然。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也无不义愤填膺。康有为抓住这个时机,邀十八省举人至宣武门外集会,当众宣读由他起草的上皇帝万言书,声泪俱下,全场激愤,签名支持者有1300多人,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痛陈《马关条约》将引起的严重后果,明确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以挽救国家危亡的建议。“公车上书”表明,资产阶级上层的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成为有实际政治意义的维新运动。此后,康有为又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为了争取上层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康有为与梁启超创办了《中外纪闻》,组织了强学会,努力扩大政治影响。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山东半岛胶州湾,更加激起了民族义愤。康有为了1898年1月第五次给光绪帝上书。他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将被瓜分的危险处境,警告光绪帝,如再不赶紧变法,“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为此他提出上、中、下变法三策,上策是“效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为“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

疆臣,各自变法”。康的第五次上书经过周折终于到达光绪帝手中。光绪阅后,颇受感动。1月29日,康有为遵旨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第六次上书),恳请皇上学习日本明治维新。随后,他又呈递《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变政记》,并第七次上书皇帝,主张效法俄、日,以君权厉行变法,促使光绪帝下定变法决心。1898年春,在救亡图存的爱国浪潮中,康有为、梁启超又发起成立了有维新人士和开明官僚200余人参加的保国会。保国会以救亡图存相号召,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保国会的成立,推动了维新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维新思潮的激荡,促使光绪皇帝下定变法的决心,并开始实际的行动。1898年6月11日,乘顽固阻挠变法的恭亲王奕訢突然死去之机,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

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第一次召见康有为,详细谈论了变法的步骤和措施。随后,许康有为专折奏事,赏六品衔,任命他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官职。

从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起,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止,共103天,故历史上称此次运动为“百日维新”。在此期间,光绪帝先后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书、谕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改各地旧书院为新式学堂,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建立报馆、学会;奖励新发明和科学发现;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不许阻止。

(二)裁撤闲散衙门,裁汰冗员;撤销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裁减绿营兵,精练陆、海军,包括八旗兵在内一律改用洋枪,用新法练兵。

(三)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